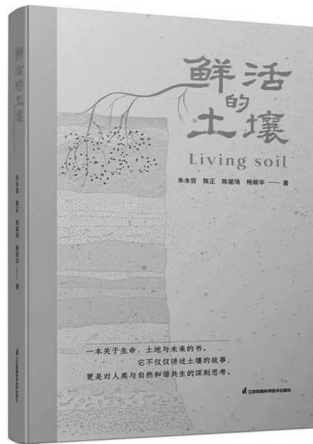


疗愈我们的“地球皮肤”

□明前茶



《鲜活的土壤》
朱永官 陈正 陈能场 杨顺华
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
2024年11月

一位种西红柿的土壤改良专家告诉我,数年前,他租了一块地,尝试通过专利技术把板结土壤重构成疏松多孔的小圆粒,可重新释放氧气与土壤中的微量元素,从而减少化肥的使用,实现令人动心的口味改良。很快,他在这片土地上种出了酸甜可口、肉质肥厚的沙瓤西红柿。这位土壤改造者双手捧出他的泥土说:我买的种子,就是市面上普通的中杂109西红柿,一切都是土壤的功劳。

吃过他的西红柿,我才能明白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永官先生等研究者,写作《鲜活的土壤》一书的意义:“地球上陆地生物得到繁衍生息所需要的养料,都与土壤这层‘地球皮肤’是否健康息息相关。”

相对于6371km的地球半径而言,土壤这层珍贵的地球皮肤比人类的眼皮还要纤薄。形成1cm厚的土壤就需要成百上千年的时间,而洪水、冰封、大风以及人类活动的侵蚀,却导致土壤流失一厘米的时间,缩短到几十年。

读这本书,让一个门外汉也能迅速认识到土壤研究与保护的意义。《鲜活的土壤》这本书,将科普性与趣味性做一番有机结合,倡导读者通过捏泥团、挤泥饼以及“和稀泥”的手法,打开感官,鉴别土壤不同的特性与附加值。本书以生动活泼的语言、出人意料的事例、丰富多彩的土壤地貌,以及科学性极强的图表图例,来向读者讲述土壤的

质地与风味、土壤滋养植物的路径,以及土壤与碳排放、碳吸收的关系。调控土壤生态系统的“工程师”究竟是谁?生病的土壤如何恢复健康?还有,人造土壤在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前景?多个土壤研究团队通过这包罗万象的思维发散,来深究有生命力的土壤,如何在21世纪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。

而书中另一个振聋发聩的部分,是对生病土壤的探讨。土壤生病跟人一样,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,有中毒的,有代谢失常的,有元素缺乏的,也有免疫功能失效的,对此,研究团队一一列举出应对方法。比如,如何减少镉元素在大米中的蓄积?朱永官先生通过对日本的镉大米研究,发现只要在水稻抽穗前后的三周时间里,确保稻田有2~3cm的覆盖水层,就能预防硫化镉大量溶解并被水稻根系吸收,进而可成功降低大米的含镉量。而东北正在流失和退化的黑土,也引发了本书作者之一杨顺华团队的高度警觉,由于气候变化和不合理的耕作方式,肥沃的黑土正面临着风蚀、水蚀、冻融侵蚀的危险,“北大仓”有可能重新变成北大荒。2022年8月1日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》正式实施,标志着黑土保护上升为国家意识。而这一切土壤保护措施的背后,都有着土壤调查人员的艰辛工作。他们身着长靴跋山

涉水,每到一地,都会挖出标准的土壤剖面进行拍照与存档。在很多土壤研究人员的心目中,他们就是工兵,走在保护耕地、保护土壤的前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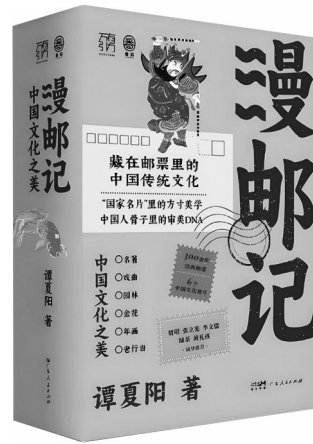
万物土中生,为了960万平方公里上的泥土今后能延续农耕传奇,继续滋养中国人,我们着手进行黑土保护,荒漠化治理,植树造林,退耕还田……这些百年大计本质上都是对土壤的保护。

土壤作为一种珍贵资源,要节流,也要开源。未来,科技工作者还将用厨余垃圾等有机废弃物,掺和石头、玻璃等无机物,构建出人工土壤,灵活调整其配方,以适应不同的种植需求。它们将与天然土壤一起,为我们找到一条更高效的碳中和路线。那时,更多的碳将被通过碳基结构储存在土壤中,土壤变肥沃,空气和水则变干净,在不知不觉中,自然系统将形成一个美妙的闭环。

唐代女诗人李冶在一首名叫《八至》的诗中写道:“至近至远东西,至深至浅清溪”,土壤研究者也许可以模仿她,这样总结自己的发现:“至贵至贱表土,至简至繁细壤。”光是一场健康土壤中的微生物,就比地球上的人口要多,鲜活的土壤既组成了地表的宏观景象,又构筑了复杂的微观生态循环,从这一点来说,了解土壤并对之常怀一颗忧患之心,就是愿意为人类的未来去做一点实事,而这,正是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啊。

方寸天地间的山长水阔

□赵昱华



《漫邮记》
谭夏阳
广东人民出版社
2025年2月

自古以来,在中国人的文化里,书信被赋予了独特的意涵,“欲寄彩笺兼尺素,山长水阔知何处?”“呼儿烹鲤鱼,中有尺素书。”到了现代,余光中《乡愁》中的名句“小时候,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,我在这头,母亲在那头。”也同样牵动着许多人的心弦。与信笺相伴,信封上那枚小小的邮票同样能勾起人的思绪。

邮票,一个国家文化的微型百科全书。山水丘陵、人文风光、万物生灵、名家手迹、百姓民生、建设成就……皆容纳于方寸之间,邮票体现着一个国家、一个时代的面貌,并且传达知识、传达审美、传达世界观与价值观。

谭夏阳所著的这本《漫邮记》,正是从文化的角度出发,选取了名著、戏曲、园林、金花、年画和老行当六个主题,经由图像探寻邮票背后的历史细节,以邮票本身作为一条线索,引领读者找寻邮票中所蕴含的、沉淀下来的中国传统的文化美学。

全书共分为三册,卷一收录了“名著”“戏曲”两个主题,这一卷所展现的,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美。如作者所言,“用邮票来表现古典文学名著,其实是新瓶装旧酒,唯有那种‘古典之美’历久弥香。”文化有其适用的范围,传统的文化串联起了过往与现在;邮票不能代替文学著作,却是这些著作图像化的视觉补充,邮票定格了一个场景,一个

人们对于书中文字的共同想象。当我们凝视这些图片,我们仿佛身处于百年前的戏院——邮票的制作者与台上的演员一样,竭尽自己心血尝试还原一个角色,每一次的尝试,都进一步地塑造了这个角色,让其形象得以立体而完整地展现。

卷二收录的“园林”“金花”主题,所展现的,便是中国的古典园林之美、自然之美。作者在此卷中如此写道:“中国古人的视觉审美观,主要体现在两个地方,一在传统书画里,二在古典园林中。与传统书画的“平面视觉”不同,古典园林是一种“立体视觉”,是人在其中的。园林脱胎自山水画,以诗词意境为参照,尝试在一方天地之内还原营造如诗如画的美景。而将其印为邮票,则可以认为是对园林之中山水要素的再提取,园林是“中国人处理自我与自然关系的一个范本”,是人们对于山水的想象,而邮票则再度将这种想象微缩到了纸面之上。这种微缩所强调的,是园林的“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”,是人们的审美,是人们对于山水的想象。

卷三所涉及的内容,则更符合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直接印象——“年画”,曾是老一辈人生活中常见的物件,如今却已消失不见。但你可知,年画也曾随着邮票一起,漂洋过海,互相成就。河北省武强县曾是全国最大的木版年画产地,当武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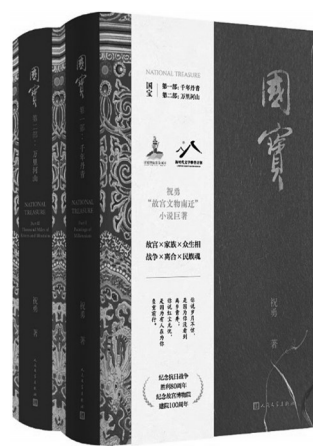
的年画被搬上邮票这一载体,印刷者们惊喜地发现,印刷邮票的过程与制作木版年画有着共通之处,印刷出来的邮票,层次分明,有效地还原了原作的面貌;武强年画就这样在漫长的沉寂之后,随邮票一起焕发了第二春。此卷下半卷,专门单列一辑,介绍中国澳门曾经发行的“老行当”邮票,这些邮票所记录的,是澳门正在逐渐消失,或是已经退出人们视野的老物件,带有一种人文主义的关怀;关注这些老物件,就像是在关注世间匆匆行走的众生。而邮票本身,又何尝不是这些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“老行当”呢?

对于邮票的关注,总是难免地会成为一场怀旧的回忆之旅,但是“怀旧”一词,不足以概括与诠释邮票的一切。邮票的制作本身,可以称为是一次已经确定了主题的“命题作文”,但仅仅满足于完成上方的任务是不够的;比起审美上的“环肥燕瘦”,我想,更为吸引人的,是感情上的寄托,寄托来自远方那个难以谋面的思念之人,也来自对方寸天地精心雕琢的设计者,他们共同构建起了文化的记忆,就像邮票所定格的空间那样,被书信文化所定格。

书信的古典浪漫或许早已离我们远去,但邮票却并不会成为它无言的墓志铭,邮票所反射出的,是我们文化中无言的美,温和淡雅、隽永豁然。

国宝南迁的壮丽史诗

□林颀



《国宝》
祝勇
人民文学出版社
2025年1月

总有一些事件如璀璨星辰,照亮历史的天空。故宫文物南迁,永远辉映史册。它不仅是一场文物的大转移,更是中华民族风雨飘摇中守护文化根脉的壮丽史诗。

1933年2月,华北局势岌岌可危,故宫珍宝危在旦夕。一场规模宏大、影响深远的文物南迁行动,悄然拉开了帷幕。从北平到南京、上海,又经长沙、汉口、宝鸡、西安等地,最后落脚四川、重庆,故宫人员保护着大批文物,辗转各地,颠沛流离。直至战争结束,在1946—1947年期间,故宫南迁文物才踏上了回归之途。

这段历史,所有故宫人都铭记在心。在《国宝》之前,祝勇就写过很多故宫历史随笔或纪实作品,其中包括《故宫文物南迁》。历史研究侧重于冷静客观的梳理推论,而文学可以呈现历史事件背后人们的行动轨迹、心路历程,让我们察觉到那些被遗忘在“历史”之外的“人”的存在。所有抵御外侮的长城底下,都埋藏着不计其数的无名者的躯骨和血泪。

祝勇屡次凝视这些故宫文物,作为一个长久沉浸于国宝故事中的故宫人,他不断地重返历史现场,他迫切地想要写下前辈的故事,他们的言笑晏晏,他们的长歌当哭,他迫切地想要更多的人看见,构造历史事件的,除了骨架与主干,还有支撑起主干与骨架的,那些纤细的肌理,那些鲜活流动

的血脉。于是,有了这部6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。

那文松,一个出身文物世家、从东北奔逃至北平、求职于故宫的职场新人。小说从他的微观视角切入。易东篱、马横岭、唐知微、石不言、丁彤云、郭之南……那文松的上司与同事,好几位都能在《故宫文物南迁》中找到原型,或者在其他记载中发现依稀的身影。他们从历史的缝隙中浮现出原貌,他们并肩携手,负重前行,有些人走了,用生命的代价铺平了道路,有些人活着,继续完成他们的遗志。

在南迁筹备阶段,他们拟定可行方案,选择缓冲材料,保护不同形制的文物,每一个折角、每一处缠绕,都凝聚着他们对文物的珍视。南迁之路崎岖艰险,他们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、行政的拖沓推诿、不轨小人的觊觎与构陷,他们衣食不保身心俱疲,而敌袭匪扰仿佛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,时刻威胁着文物的安全,在每一个惊心动魄的存亡时刻,他们都把文物的安危放在了自身的安全之前。

这是一群可歌可泣的故宫人。除了他们,我们要记住的,还有:梅从云、梅遇影、那永城、那文柏、丁铁竹、沈芷依、蓝星宇、郎山岳……或不惜性命拒绝投降,或投笔从军抗击日寇,或在“国家”与“小我”之间毅然抉择大义,他们的心灵何尝不是在经历着“南迁”?

梅遇影是那文松的妻子,她两次寻夫的经历,是小说的另一条主线。第一次,她怀孕在身,听闻丈夫失踪,焦虑之下,带着女儿鸾凤上路,不幸被土匪绑架,鸾凤被卖入广西大山,她身陷匪窟。第二次,她父母双亡,只身携带幼子,再次踏上寻夫之路,却不幸与幼子在途中离散。如果那文松没有跟随文物南迁,梅家和那家的悲剧是不是能减少一些呢?这是梅遇影的怨念,也是我们作为读者自然而然的联想。故宫人,费尽心思保护了文物,却无力保护自己的亲人。梅遇影的经历,是战争中千千万万无辜女性的缩影,与书中涉及的淞沪抗战、南京屠城、北平饥饿、花园口黄河决堤、重庆轰炸等事件交织在一起,所有的战争,都是生灵的涂炭、黎民的苦难。

我们要记住的,还有所有帮助完成这场接力的人们,他们是“被放弃”的家属,他们是随行保护和运输的军车司机,他们是在整场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数万辆火车司机和铁路维修人员,他们是所有尽心付出一己之力的人们,比如那个60多岁的重庆挑夫,一肩挑起千钧之力。

这场故宫文物南迁行动,历时14年,行程两万里,穿越大半个中国,涤荡烽火硝烟,跋涉万水千山,上百万件文物几无遗失或损坏,这是叹为观止的奇迹。千年丹青,万里河山。国之瑰宝,在物,也在人。有宝贵的人们,才有宝贵的物的珍存,才有人类文明的延续。